

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

王尧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

王尧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 / 王尧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2
ISBN 978-7-108-04714-4

I. ①作…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0549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李学平

封扉设计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6.5

字 数 198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45.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001
“重返 80 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019
冲突、妥协与选择	030
如何现实, 怎样思想	042
关于“90 年代文学”的再认识	059
重评《废都》兼论 90 年代知识分子	082
“思想事件”的修辞	099
“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	117
五个“关键词”的修订与当代文艺思潮的演进	136
一份书目单与“红色经典”的沉浮	152
四本书与四个问题	169
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	194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向后转”问题	214
何谓批评家与批评家何为	226
批评的轨迹	237

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	243
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	246
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	251
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	257
跋	260

“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将中国当代文学“60年”作为一个完成的历史时间段加以研究颇具现实意义，其学理依据未必充分。迄今为止，尽管关于何谓“当代文学”的见解不断，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构架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这是这一学科虽然不乏优秀成果但尚未成熟的反映。近两年来，因“改革开放”30年、共和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文学”（或“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当代文学60年”便成为热门话题。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曾经认为借助于政治的、社会的话语来命名一段文学发展过程，不是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这或许是我们学术上的一个困境，也可能是我们这一学科的特色，它的“当代性”总是反映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又在积极的意义上，由“外部”而返回“内部”。

如我们把“现当代文学”分开的话，“现代文学”30年，“当代文学”60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以1978年为界，有了新时期文学30年的概念；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又有了“两个30年”的概念，也就是1949—1979年，1979—2009年两个时间段。在这两个“30年”之间，关于当代文学60年的中间点不时发生变化，显然

说明,当代文学的两个“30年”之间有一过渡的时间带,1978年或者1979年都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年份,是选择1978还是1979年,并无本质的差异。1978年以来的30年文学,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整数,恰好与“改革开放”30年相同。近年来无论是“新时期文学30年”还是“改革开放30年文学”等话题,其命名及相关讨论都顺着“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势进行。尽管我们侧重的是30年文学,但为何凑足整数提“30年”而不作其他表达?显然,离开30年的“改革开放”是无法讨论文学话题的。因此,关乎“新时期30年文学”之类的学术研究,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改革开放30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宏大叙事”中的文学问题。关于近30年文学的讨论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且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受此制约。这个30年,部分已为“历史”部分仍是“现实”,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有许多困惑,而关于文学的困惑常常不只是来自文学本身,而且源于文学的处境。即便讨论文学话题,通常也是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展开的。如果需要比较精确地划出两个“30年”,那么中间的一个时间点和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79年12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的报告提出了“30年”的概念,从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开始到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30年。

将中国当代文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做法在早几年就开始出现,“现在有两分法,即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或叫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前一时期,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计划经济,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后一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文艺由从属于政治转向虽不脱离政治,却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的制约。”^{〔1〕}这是从政治的差异性层面

〔1〕 张炯:《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观念与方法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上划分了两个阶段，突出了当代文学不同阶段的语境差异。但差异之中的一致性仍然是社会主义实践，而落实到文学，则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在不同阶段的展开。现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早些年不一样，已经无须急于给当代文学作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界定，但是，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需要我们着重考察、辨析的内容之一。改革开放深刻反映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变化上，文化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文学仍然是在变化了“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发生、发展这一事实。我们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时，可能会比较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学制度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很长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想关注两个 30 年不同阶段的关联问题。

二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 30 年，也就是 1949—1979 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周扬在 1979 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用“艰巨的历程”来形容这个 30 年的文学艺术事业。我们今天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不能不回到它的最初阶段，虽然 60 年变化巨大，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几乎从当代文学发生时就预设并且延伸下来。第一个 30 年，因为承接“延安文学”，经历“文革”文学，又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其中的关联问题显得十分复杂和棘手。

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以后，将“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关联起来的研究已较为普遍，其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价则和前此有了许多不同，从而也因此改变着

“十七年文学”研究。我们曾经对这样的研究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对深入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有重要意义。有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差不多都是从1942年开始叙述当代文学的发生的。

其实，对“1942年”的重视由来已久。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1942年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文革”开始以后，每年关于纪念《讲话》的社论是我们研究《讲话》这一经典文献在当代如何解读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左的、极左的，还是“回到自身”的文学理论批评，几乎都是从解读《讲话》和“延安文学”来论述当代文学的初始历史及其影响的。我以为这是讨论1949—1979年这个30年文学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文革”时期一些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论著，已经建立了以1942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如辽宁大学自行刊印的《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第一章就写“延安时代”，其中包括强调“解放后对40年代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流毒的‘再批判’”。为什么要从40年代开始写起？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再者，著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彻底清算了周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罪行，而且也彻底批判了周扬在历史上，从上世纪30年代到延安时期一贯推行的文艺黑线”。这意味着从40年代写起也就为“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找到了根源，重提“再批评”实际上是为了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对延安时期的“文艺黑线”就有所警惕。这就涉及对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了。“文革”对现代文学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五四新文学、鲁迅与左翼文学、30年代文艺等方面。对延安解放区文艺的评价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已有主调，但是周扬等人在“文革”中已经丧失了解释解放区文艺的话语权。1967年姚文元发

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主流话语突出了对周扬、丁玲等人的批判。“文革”时的教科书和文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解释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两条路线、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被概括为现代文艺运动的本质特征。对这种斗争的描述与分析代替了对现代文艺自身演进历史的分析。在主流文艺思想中，“五四”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洪流”，“与此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作为五四运动的缺点，及这种缺点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流延，这是资产阶级道路的传统，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20年代以来的文艺斗争，30年代来的‘四条汉子’的文艺黑线，以至建国后发生的批判胡适派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反胡风、反右派，以及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艺思想，都与五四时期两个对立的潮流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这样一种阐释，可以视为“文革”时期主流话语对40年代以来文学的关联研究。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否定了“五四”传统，又从“延安文学”中划出了一条连接“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十七年”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就在这样的历史阐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在新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述关联论述的清理，以及对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思想的重新评价。而有意思的是，“文革”后否定了所谓“十七年”时期的“文艺黑线”，但始终少有对周扬在延安时期就推行“文艺黑线”这一论调作深入的批判。这条“文艺黑线”自然并不存在。

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周扬对社会主义文艺诞生的历史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其一，“伟大的十月革命使苏俄文学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前哨。我国新文艺最初就是以俄国和北欧、东南欧的文艺以及苏联文艺为借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在散文和诗歌方面，为我国新文艺奠定了不朽的基础。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这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飞跃。”其二，重点阐述了30年代文艺，尤其是革命文艺、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个阐述不仅是回击《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30年代文艺的否定，也从正面回溯了当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其三，重点阐释了《讲话》和延安解放区文学是如何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广阔道路的，这样也就把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在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关键点上巩固起来。其四，关于国统区文学的评价，“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1〕}。我们会注意到，西方文学和左翼文学之外的作家作品对新文艺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在报告中阙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资源何以偏重一个方面的原因。

因此，我提出当代文学是在一种“扩大了的了解区意识”中发生和发展的。它规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规定了“十七年文学”的思想来源与文化资源，也规定了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当代文学制度。

三

无论是在“文革”时期还是在“新时期”初期，无论“文革”发动者还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都注意到了“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但是两者的立足点和阐释角度不同，论述的重点也

〔1〕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有本质差异。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说：“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大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姚文元在文章中提到的作了长时间准备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1954年到1955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1957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此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1959年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些“历次重大的斗争”一步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姚文元在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作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文革”后，对姚文元所说的这些重大斗争的性质、意义，我们已经作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阐释。

需要讨论的是，周扬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

关联？我以为周扬的一段话在新时期初期是一个比较中肯的分析：“无可否认，我们的文艺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我们的工作中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污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极左的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某些‘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所肆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原谅自己的过失。”^{〔1〕}这一简短论述，明确了三点“原则性”意见：否定了林彪、“四人帮”对“十七年”文艺的批判，肯定“十七年”文艺成绩主要、主流正确；“文革”是从极左的方面利用和恶性发展了以前工作中的错误；“左”的错误和极左路线有本质的不同。其中的第二点无疑清晰地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而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就是由“左”到“极左”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前面所举的两种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阐释何以在一些问题上重叠。我以为，这一点仍然是我们讨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

那么，“十七年”时期的缺点、错误或者教训是什么？周扬报告的表述是：“我们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由于当时的一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以及自己头脑中‘左倾’思想没有得到有效克服，有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

〔1〕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我们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致助长了理论上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产生了粗暴批评，损害了以上民主。”这些错误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为阶级斗争、极左政治和文化专制。

周扬以文艺工作领导者身份检讨“十七年”的问题，但我更愿意看成是对文学制度的反省。“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的错误，其实是整个文学史进程中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制度的一部分。包括周扬在内的这些文艺工作领导者在“文革”期间也遭遇了批判或者受到迫害，其悲剧命运说明，这不是几个人的失误问题，是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困境造成。“文革”用极端的方式来对待周扬这些文艺工作领导者以及广大的文学工作者，而这种方式和前此的错误方式有类似之处，一旦极端化，文学史的进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许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没有“十七年文学”，何来“文革”文学。在50—70年代的“一体化”过程中，“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我以为，文学史论述需要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新时期”初期，我们是把“新时期”的开始和“文革”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在谈到第四次文代会的意义时周扬指出：“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已经开始。”而随着文学的发展，“新时期”在否定“文革”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批判，也不可避免地在政治批判之外用学术研究对待“文革”文学。文学史论述总是在呈现历史复杂性的过程中达到相对成熟。

用主流和支流的两分法未必妥当，文学史进程中的纠葛远非一分

为二即可以划定的。而一旦具体到作家作品，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两分法或许可以原则地评价“十七年文学”，而不能代替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史发展中的矛盾运动的揭示。以“十七年文学”而言，上述“左”的错误如果称为“支流”，那么“主流”是什么呢？我想还是援引周扬报告中的一段文字：“回顾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除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同志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他总是结合实际，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他和陈毅同志历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深刻地阐发了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发扬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对我国文艺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1961和1962年分别召开的讨论电影、戏剧问题的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是成功的。文化部、文联党组于1962年针对一个时期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即《文艺八条》），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中是得到肯定的，这样的“主流”和“支流”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但是，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既定框架中，它们分别给文学创作以什么样的影响，给整个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以什么样的影响，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在其中产生的。历史的实际状况是，“十七年”时期的“支流”在“文革”时期成了“主流”。“潜在写作”概念（我更倾向于“地下写作”）的提出，打开了讨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另外一个空间，但体制内的写作如何评价的问题并未消失。在“现代性”概念引入到文学史写作之后，“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也成为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的一个视角并且延伸到“文革”文学研究之中。当我们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一种“现代性”时，对西方“现代性”的排他性是一种批判，但是，如果我们止于此，而不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出批判时，又有可能将“现代性”定于一尊。所以，在深入体察“十七年文学”的复杂的历史语境时，我以为还要比较更多地关注作家在历史语境中的矛盾冲突从而对文本和文本背后的因素有深入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文学既是我们历史本身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评判60年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四

无疑，近30年文学，也就是60年中的第二个30年，是新文学以来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通常在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时，也是以近30年文学为主的。对这30年文学通常又划分为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三个阶段，而对80年代的评价又相对集中些，共识也多些。如何评价80年代之后的两个时间段则分歧迭出。我在此关注的是第一个30年与第二个30年的关联问题。

我们是如何开始新时期初期的？文艺批评的状况是一个考察的角度。朱寨曾经这样叙述：“粉碎‘四人帮’初期，文艺界对‘四人帮’的笔伐严格说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政治的控诉。当时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与其说是批驳，不如说是辩白。在批黑八论上甚至与‘四人帮’争功：‘其实黑八论我们早就批过了。’事后说来觉得好笑，而在当时却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当时文艺上的一系列理论是非还颠倒着，我们新文艺运动代表人物的名字还打着‘×’倒写在黑板上。《人民日

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批判张春桥（狄克）的文章，首先还是从批‘四条汉子’开刀，把‘四人帮’的文艺罪状挂在‘四条汉子’名下，指为祸首。难道这也是一时失误的趣闻吗？如果说好笑，其实是历史的自我揶揄嘲笑。当时围绕着所谓‘黑八论’对‘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批判，表面看来相当活跃，实际上还是戴着枷锁的舞蹈，在愤怒的控诉中，有夹杂着思想锁链的叮当声。”^{〔1〕}朱寨所说的这一现象，也有其他论者提到^{〔2〕}。197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所编《“阴谋文艺”批判》中的论文有不少都反映出朱寨所说的这些特征。

这些现象的本质，如果只是认为此为过渡时期的局限，我们就无法理解历史转折中的复杂关系和内部张力。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的揶揄嘲笑”，实际上呈现的不是当时观点和方法的局限，而恰恰说明，那段“历史”是我们共同参与制造的。由“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做过许多清理，基本上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虽然对“十七年”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论述，但在价值判断上，鲜有论者会肯定从属于政治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文艺，即使到今天我们又再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在否定那些文艺思潮时，否定那些文学话语时，我们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清理知识分子在主流话语形成过程中

〔1〕 朱寨：《导言》，《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理论二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2〕 伍宇在《中国作协“文革”亲历记》中记述了这样的史实：“1978 年冬天，那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一班文友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在广东的肇庆。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处所，自古端砚的产地，湖光山色。大家自然议论‘文革’十年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难，文艺界更是被整得七零八落，创伤累累，创作生产力凋敝，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而‘四人帮’的覆灭，意味着什么呢？有的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的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传记文学》1994 年第 9 期。